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朱玉麒 主编

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唐朝西州与伊州的交通

杜甫“观兵”诗新解——唐乾元二年西域援军再次入关史实钩沉

黄文弼先生与甘藏吐鲁番文献

新出唐刘文祜墓志所见西域史事考

敦煌元代汉文官文书续考

张庆捷

孟宪实

吴玉贵

荣新江

王庆卫

党宝海

卮符号的初传及其原始寓意

新疆发现麻黄与大麻及有关问题

新疆地区发现的圭字形剑鞘的研究

固原九龙山M33出土下颌托研究

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时期之龟兹当地用纸

——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库车出土汉文书案例研究之一 庆昭蓉 江南和幸

刘学堂

刘文锁

林铃梅

陈婧修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所记载的古鄯善国刑罚及其源流

高昌货币史上的毯本位时代

移健与时健——源自亲属称谓的古突厥名号

葛儿罕称号考

中国元代景教碑铭纪年辨析

苏公塔碑——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标志 乌苏吉 卡里米安 撰；徐维焱 译

姜一秀

裴成国

陈 恩

白玉冬

马小鹤

傅斯年图书馆藏内阁大库档案中的徐松资料

近代伏尔加鞑靼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金帐汗国”想象与穆斯林认同

——读阿雅兹·伊斯哈齐《亦德勒—乌拉尔简史》

刘半农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交涉始末

万里流沙双仲良——黄文弼与丁道衡的西北考察交谊

1949年前后的黄文弼

朱玉麒

周思成

王冀青

吴华峰 徐玉娟

刘子凡

西域文史

朱玉麒 主编



【第十二辑】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西域文史

(第十二辑)

朱玉麒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西域文史》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合出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22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本书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文史. 第十二辑 / 朱玉麒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03-058219-5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文史资料—西域 IV. ①K294. 5②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2307号

责任编辑: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邱 炯 陈 敬
封面题签: 冯其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4 1/4 插页: 2

字数: 570 000

定价: 1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Studies of Literature & History on the Western Region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Vol. XII

Zhu Yuqi Editor-in-Chief

Science Press

Beijing

《西域文史》编委会

主 编 朱玉麒

编 委 (按姓名首字拼音排序)

-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
陈开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贾丛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 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刘安志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罗 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孟 楠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
施新荣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王 欣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王冀青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乌云毕力格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于志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余 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铭心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赵 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英文编审 王媛媛 蒋小莉

目 录

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张庆捷 (1)
唐朝西州与伊州的交通	孟宪实 (19)
杜甫“观兵”诗新解——唐乾元二年西域援军再次入关史实钩沉	吴玉贵 (33)
黄文弼先生与甘藏吐鲁番文献	荣新江 (51)
新出唐刘文祐墓志所见西域史事考	王庆卫 (59)
敦煌元代汉文官文书续考	党宝海 (71)
𠂔符号的初传及其原始寓意	刘学堂 (81)
新疆发现麻黄与大麻及有关问题	刘文锁 (107)
新疆地区发现的圭字形剑鞘的研究	林铃梅 (127)
固原九龙山M33出土下颌托研究	陈婧修 (145)
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时期之龟兹当地用纸——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库车出土 汉文书案例研究之一	庆昭蓉 江南和幸 (159)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记载的古鄯善国刑罚及其源流	姜一秀 (179)
高昌货币史上的毯本位时代	裴成国 (205)
移健与时健——源自亲属称谓的古突厥名号	陈 愆 (215)
葛儿罕称号考	白玉冬 (233)
中国元代景教碑铭纪年辨析	马小鹤 (249)
苏公塔碑——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标志	乌苏吉 卡里米安 撰; 徐维焱 译 (277)
傅斯年图书馆藏内阁大库档案中的徐松资料	朱玉麒 (289)
近代伏尔加鞑靼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金帐汗国”想象与穆斯林认同 ——读阿雅兹·伊斯哈齐《亦德勒—乌拉尔简史》	周思成 (307)
刘半农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交涉始末	王冀青 (319)
万里流沙双仲良——黄文弼与丁道衡的西北考察交谊	吴华峰 徐玉娟 (349)
1949年前后的黄文弼	刘子凡 (361)
《西域文史》第十二辑著译者单位及文章索引	(373)
《西域文史》简介与稿约	(374)

Contents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Route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Zhang Qingjie (1)
Transportation between Xizhou and Yi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	Meng Xianshi (19)
New Perspective on Poems Titled <i>Guanbing</i> of Du Fu: Studies on the Loyalist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2 nd year of Qianyuan Era	Wu Yugui (33)
Huang Wenbi and the Turfan Documents Preserved in Gansu Museum	Rong Xinjiang (51)
On the Historical Events concerning the Western Regions Recorded in the Newly Unearthed Epigraph of Liu Wenhui	Wang Qingwei (59)
Further Remarks on Official Manuscripts of the Yuan Dynasty from Dunhuang	Dang Baohai (71)
Early Spread of the Symbol “卐” and Its Original Implication	Liu Xuetao (81)
The <i>Ephedra</i> and <i>Cannabis</i> Discovered in Xinjiang	Liu Wensuo (107)
Research on Dagger Sheaths with Four-lobed Form Found in Xinjiang	Lin Lingmei (127)
A Study of the Chin-strap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M33 of Jiulongshan in Guyuan	Chen Jingxiu (145)
Paper Used in the 8 th Century Anxi Protectorate, Part I: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 Fragments Kept in the Ryukoku University (Japan) Unearthed from Kucha.....	Ching Chao-jung & Enami Kazuyuki (159)
Punishment i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ound in China and Its Possible Origin.....	Jiang Yixiu (179)
The Study of the Age of Blanket Standard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Gaochang District.....	Pei Chengguo (205)
Yigān and Čiqan: Kōk Türk Titles from Kinship Terms	Chen Ken (215)
On the Title <i>Gür-khan</i>	Bai Yudong (233)
Analysis of the Dating Systems of Nestorian Inscriptions from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	Ma Xiaohe (249)
The Turfan Minaret Inscription: A Symbol of Cultural Confluence on the Silk Road	Mohammad Bagher Vosooghi and Hassan Karimian (tr. Xu Weiyan) (277)

Xu Song Materials in the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 Housed in Fu Ssu-Nien Library	Zhu Yuqi (289)
Imagined “Golden Horde” and the Muslim Identity for the Volga Tatars’ Nationalism in Modern Russia: Ajaz Ischaki and His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Zhou Sicheng (307)
On Liu Bannong’s Dealings with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Wang Jiqing (319)
The Friendship of Huang Wenbi and Ding Daoheng during the Northwestern Scientific Expedition.....	Wu Huafeng & Xu Yujuan (349)
Huang Wenbi in around 1949.....	Liu Zifan (361)
Contributors.....	(373)
Introduction to the <i>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i>	(374)

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张庆捷

南北朝时期，随着世界各地之间联系的增加和了解，在陆地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长足发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大量的丝绸、陶瓷等远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各地区，各地区的货物也陆续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本文即就各国已发现的部分考古资料为线索，探讨中国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得到深度开发，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追上黄河流域，同时，随着该时期航海技术的发展，周边许多国家通过海路访问中国，中国也派遣使者乘船访问诸国，这些交流在史书中有所记载。各国出土考古资料显示，该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交往密切的，主要是日本、百济和新罗。

早在东汉，日本已经和汉政府发生交往，《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①有趣的是，该印于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现存福冈市博物馆，印为方形，边长2.3厘米，高2厘米，蛇纽，纯金质，篆体阴文，印文为“汉倭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实物资料与史籍记载相互吻合，反映出日本与中国早期交流的历史。

魏晋时期，两国继续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流，日本派使节赴华，向曹魏赠送礼品，曹魏回赠了各种纺织品、五尺刀、铜镜等，丝织品在中方赠品中数量最大，也很醒目，说明丝绸对日本来说是珍贵礼品^②。

南北朝时期，两国联系依然保持，《南齐书·蛮、东南夷传·倭国》记载：“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汉末以来，立女王。土俗已见前史。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③萧齐建元元年是479年，这时期正是日本的古坟时代。日本古坟时代为公

① 《后汉书》卷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2821页。

②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倭人传》记载：“景初二年（238）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纁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四、紺青五十四，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紺地句文锦三四、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四、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857页。

③ 《南齐书》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872年，1012页。

元4—6世纪，与南北朝时期基本相当。倭国与南朝来往，政治联系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学习南朝的文化技术。尽管史书不见有关记载，然而通对比可以看到，古坟时代无论是墓葬形制、石葬具，还是伴随的随葬品内容，如兵器、生活用具、马具、陶俑等，都带有南北朝文化的痕迹。举例来看，日本群马县观音山古坟出土了刀具、带具、马具、甲冑、铜镜、铜水瓶及轮埴等随葬器物，受中国和百济影响较大，有的甚至与北朝关系很大，最典型的是一件随葬的鎏金铜瓶，其外部形制与内部结构皆与太原北齐库狄迴洛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铜瓶一致，库狄迴洛墓铜瓶为细颈，卵形腹，圆底，圈足，盖顶为锥形纽，盖里衔接二铁片（似镊舌）插入瓶内，通高18.2厘米^④；观音山古坟出土铜瓶，细颈，卵形腹，圆底，圈足，盖顶为锥形纽，盖里衔接二铁片（似镊舌）插入瓶内，通高31.3厘米^⑤。两者比较，外形相同，只是大小有别；铸造技术和鎏金技术也相同。日本有学者经过研究，认定群马县观音山古坟出土铜瓶源自北齐，推测这种铜瓶的流传轨迹，极可能是入华日人从北朝学到技术，并携带样品回本土，随后又生产的。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在北朝史书中没有记载与日本的交往，仅是出土文物信息透露出日本人可能到过北朝，还学了铸造技术，购买了北朝鎏金铜瓶。这个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书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细节。日本人喜爱鎏金铜瓶，各博物馆保存不少从北朝到唐代的铜瓶，特别是正仓院，保存着许多隋唐时期的铜瓶。有从中国过去的，也有本土生产的。

除铜瓶外，观音山古坟还出土一件带铭文的兽带铜镜，直径23.3厘米，镜背面内区中心为半球形纽，周围有九个小乳钉，有三个汉字，为“宜子孙”，外为三道环形弦纹，中区纹饰带为七个较大乳钉，其间配列四神三兽。外区有唐草纹、横纹和锯齿纹，镜缘较宽，有草叶底纹，有一圈铭文，铭文为：“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如金石□□□兮。”在中国，这种铜镜纹饰主带上因有七个较大乳钉，称之为“七子镜”“七乳神（瑞）兽纹镜”或“七乳禽兽纹镜”。纹饰相近的兽带镜在日本多地出土，如福冈县冲ノ之岛21号遗迹、宫崎县山ノ坊古坟、宫崎县持田1号坟、熊本县国越古坟、奈良县藤ノ木古坟、三重县木ノ古坟、爱知县笹原古坟、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都出土过兽带镜^⑥，形式基本相同。有的有铭文，有的没有。

观音山古坟出土的这面带铭文兽带镜，与百济武宁王墓出土的铭文兽带镜十分接近。百济武宁王陵出土铜镜三面。第一面为兽带镜，出自王妃头部。直径18.1、缘高0.6厘米。圆纽座，其周围有九个小乳钉。中区主要纹饰带为七个较大乳钉之间配列四神三兽。第二面为宜子孙兽带镜，出自王的头部。直径23.2、缘高0.7厘米。圆纽座，周围有九个小乳钉，其间有铭文“宜子孙”和似小兽形纹样。中区纹饰带为七个乳钉之间配以神兽，但腐蚀不清。外有一圈铭文，也已无法辨认。两枚铜镜的共同之处，就是在镜背纽座周围都有九个小乳钉，另在纹饰带上，都有七个较大乳钉和神兽；不同之处在于，

④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385—386页。

⑤ 群马县立博物馆《观音山古坟と东アジア世界》，日本上每印刷工业株式会社，平成11年（1999），59页。

⑥ 群马县立博物馆《观音山古坟と东アジア世界》，83页。

一大一小，一个有铭文，一个没有。武宁王陵的第三面铜镜是一面方格规矩神兽纹镜，出自王的足部。直径17.8、缘高0.7厘米、在围绕中心圆纽座的方格内有小乳钉和十二辰文字。主要纹饰区是以中国汉代流行的方格规矩纹作地，上面浮雕刻画出神人狩猎的场面：四只兽围绕中心疾走，神人持戟追赶，上身裸体，下身穿简单的三角裤，头挽发髻。在狩猎纹外有圈铭文为“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金石兮”^⑦。

武宁王陵出土的第二面兽带镜，与观音上古坟出土兽带镜相比，纹饰相同，直径相差1毫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者是同形镜。可惜武宁王陵出土这面兽带镜的铭文不清晰，但是反过来据观音山古坟出土铜镜铭文推析，铭文内容也应该相同。另外，武宁王陵出土第三面铜镜也有铭文，为：“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金石兮。”与观音上古坟铜镜铭文相近，首句是“尚方作竟真大好”，相差一字。这种以“尚方作镜”为铭文首句的铜镜，一般称为“尚方镜”。

很明显，观音山古坟出土铜镜与百济武宁王陵出土兽带镜有很深渊源关系。再考察武宁王陵出土兽带镜的来源。可以看到又与中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从铜镜纹饰和铭文看，显然来自中国铜镜。在中国汉代铜镜中，常见这种“七子镜”或“七乳神（瑞）（禽）兽镜”，有的直接简称“神兽镜”。如广州东郊沙河汉墓出一面汉镜，与武宁王墓出土镜相近，就称为“神兽镜”^⑧。梁简文帝《望月诗》曰：“流辉入画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桂花那不落，团扇与谁装。空闻北窗弹，未举西园觞。”诗中“七子镜”，指的就是“七乳神（瑞）（禽）兽镜”。这种铜镜出土不少，是东汉常见镜^⑨。“尚方镜”是以铭文特征分类的名称，铭文有多种格式，这种依照铭文首句带“尚方”二字的，就称为尚方镜。“尚方”铭文见于多种镜种上，如湖南益阳东汉墓出土铜镜：“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四海。”^⑩广西贵县1978年广西贵县北郊汉墓出土铜镜铭文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孚由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⑪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出土铜镜铭文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泉玉饥食枣，浮油天下。”^⑫河南省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铜镜铭文为：“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乐未央。”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⑬这类大同小异的“尚方镜”，见之于南北各地，流行于东汉至南朝，北朝少见。由上述例子可见，日本观音山古坟和韩国百济武宁王陵出土铜镜的铭文，其格式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源自汉镜

⑦ 贾梅仙《朝鲜南部武宁王陵简介》，《考古学参考资料》第6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72—73页。

⑧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沙河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2期，56—57页。

⑨ 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嘉祥县出土古代铜镜》，《考古》1986年第10期，956—958页；范平《湖北襄樊出土一件东汉铜镜》，《文物》1992年第12期，33页。

⑩ 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545—546页。

⑪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考古》1985年第3期，210页。

⑫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96页。

⑬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23—24页。

铭文，其纹饰源于东汉魏晋铜镜^⑭，可证当时中、韩、日之间的密切文化交流。

日本古坟时代，汉字和干支纪年法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日本和百济。1961年，日本奈良县栢本东大寺山古墓出土“百炼”钢刀一柄，全长103厘米，背部有34字错金铭：“中平□□五月丙上造作（支刀）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详）。”^⑮中平是东汉灵帝年号（184—189）。中国汉代刀剑的铭文格式大体为：年号（时间）+工官或工匠名称+吉祥语。如徐州汉墓出土“建初二年剑”，剑柄正面有隶书错金铭文“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练□□□孙剑□”21字^⑯。1974年，山东省临沂地区苍山发现一把东汉永初六年（112）制造的钢刀，全长111.5厘米，环首呈椭圆形，环内径2—3.5厘米，刀身有金错火焰纹，刀背有错金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涑大刀吉羊宜子孙。”^⑰由此可知这把刀是汉安帝永初六年即公元112年经过三十次折叠锻打制成的。奈良天理市出土的这把大刀铭文基本上也是这个格式。1968年，日本发掘了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了各种铁器、青铜器等随葬品，其中有一件铁剑，长73.5厘米，宽3.15厘米，经过X射线照相检测，发现其剑身带有“辛亥年七月中……”等共100余字的铭文^⑱，故被研究者命名为“辛亥铭铁剑”，铁剑铭文多数是汉字，少数几个可能是日本模仿汉字新造的字。该墓的年代为5世纪，这把刀也属于这个时期。日本已经出土多个古坟时代带铭文刀剑，铭文多见干支，说明早在古坟时代，日本已经开始使用汉字和干支纪年。我们知道天干地支组成的干支纪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纪年方法，日本古坟时代出现这样的纪年，再次证明了中日早期的文化交流。

百济、新罗距离中国更近，因此南北朝与百济、新罗保持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就考古资料看，最典型的例子是百济武宁王墓，不仅墓葬形制、结构以及壁画与南北朝关系密切，而且随葬品中有来自中国梁朝的铜镜、青瓷器皿、墓志、铁钱等^⑲。还出土许多流行于南北朝的纹饰和百济王封印以及“梁官瓦为师矣”铭文的莲花纹砖。这与史籍中南朝梁向百济赠送《涅槃》等佛教经义，并派遣《毛诗》博士和画师、工匠等人员的记载正相吻合^⑳。百济从中国引进的佛教典籍、技术、器物等，后来又陆续传向日本，形成明显的海上丝路文化传播轨迹。如日本观音山古坟出土铜镜与武宁王墓的相同，而武宁王墓的铜镜来自南朝。武宁王陵随葬铁五铢钱为一串、数量多达90余枚^㉑，大小不一，铁钱或直径24、方形穿孔的宽度为8毫米；或其测量数据为直径22、穿孔宽7毫米。这批钱，也是来自南朝萧梁政权。据《通鉴·梁纪五》载：“梁初铸五铢钱，肉好周郭

⑭ 周裕兴《武宁王陵出土文物分析（2）——以铜镜为例》，《百济文化海外调查报告V》，国立公州博物馆，2005年。

⑮ 梅原末治《奈良县栢本东大寺山古坟出土の汉中平纪年の铁刀（口绘载说）》，日本《考古学杂志》48卷2号，1962年。

⑯ 徐州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涑钢剑》，《文物》1979年第7期，51—52页。

⑰ 刘心健、陈自经《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年第12期，61页、图版伍。

⑱ 埼玉县教育局《埼玉稻荷山古坟》，1980年，56—58页。

⑲ 金英媛《武宁王とその出土遗物》，群馬县立博物馆《观音山古坟と东アジア世界》，103—107页。

⑳ 《南史》卷七九《东夷·百济传》记载：“（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973页。

㉑ 邵磊《百济武宁王陵随葬萧梁铁五铢钱考察》，《中国钱币》2009年第3期，38—47页。

皆备，别铸无肉郭者，谓之女钱。民间私用女钱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议尽罢铜钱，（普通四年）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②萧梁五铢钱，在中国已有发现^③，但是在海外发现不多。武宁王墓出土这批铁五铢钱，正是与南朝交流的信据。

武宁王墓出土的墓志最能说明百济与南朝的关系，武宁王陵出土志石2块，王和王妃各1块，均出自币道中部石兽前面，王志石长41、宽35、厚5厘米。正面阴刻铭文六行：

宁东大将军百济斯
麻王年六十二岁癸
卯年五月丙戌朔七
日壬辰崩到乙巳年八月
癸酉朔十二日甲中安厝
登冠大墓立志如左

背面阴刻线上刻有天干地支（缺申、庚、酉、辛、戌）。

王妃志石长、宽同上块，厚4.7厘米，正面刻铭文四行：

丙午年十一月百济国王太妃寿
终居丧在酉地己酉年二月癸
未朔十二日甲午改葬还大墓
立志如左

背面阴刻铭文六行：

钱一万文右一件
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宁东大将军
百济斯麻王以前件钱讼土王
土伯土父母上下众官二千石
买申地为墓故立券为明
不从律令^④

该墓志的形制、内容书写方式以及买地券内容，与南北朝流行的墓志相同，也是南北朝与百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物证。值得注意的是，志文中首句是“宁东大将军斯麻王”，这个“宁东大将军”是南朝的官职，是南朝授予百济王的。《梁书·诸夷·百济传》专门记载：“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高祖诏曰：‘……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待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⑤墓志没记载“使待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却记载了“宁东大将军斯麻王”，说明百济非常重视“宁东大将军”一

② 《资治通鉴》卷一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4676页。

③ 陈浩《浙江省首次出土五铢铁钱》，《中国钱币》1984年第2期，12页；范卫红《南京出土萧梁钱范、铁钱初识》，《中国钱币》2000年第2期，4—7页；南京博物院《南京市灵山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1期，58页。

④ 贾梅仙《朝鲜南部武陵王墓简介》，《考古学参考资料》第6期，75—76页。

⑤ 《梁书》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04页。

职，间接反映了与南朝的密切关系。该墓葬还出有15件瓷器，分青瓷、黑釉瓷和白瓷三种，学界都认为，青瓷和黑釉瓷出自南朝，没有争议，争议集中在白瓷的烧制地点和时间上。笔者不揣浅陋，认为有可能来自北朝，因为南方至今还没有发现唐代白瓷窑遗址，北方却有，已经成批量出口，故推测百济白瓷出自北方窑的可能性大。

还需要说明的是宋山里古坟群6号墓里的壁画，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用石壁垒起来的壁画。整个坟墓长4米，宽2.5米，南北呈长形隧道状，顶部则是椭圆形的屋顶。石壁上涂抹泥土做地杖，然后在上面绘画。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图。四神图在汉代墓葬已经出现，在两晋南北朝唐代，广泛见于南北各地，如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西晋“太康七年（286）”纪年墓^{②6}、镇江南郊东晋“隆安二年（398）”纪年墓^{②7}、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壁画墓^{②8}、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壁画墓^{②9}、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③0}、太原北齐娄叡壁画墓里都有^{③1}。宋山里6号墓所见四神图，显然受到南北朝墓葬文化的影响。

其他百济墓葬出土器物，也有的明显与南朝有密切关系。1997年，公州大学博物馆对忠清南道天安市郊外龙院里一带的百济古墓群做了发掘，有土坟墓，也有石室墓。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随葬品，包括陶器、铁器、金铜耳饰和玉器，其中仅陶瓷器就有350件，且器种多样。据韩国学者研究，该批墓葬的年代大概是迁都公州之前，即4世纪到5世纪早期。其中，9号石室墓中出土一件黑釉鸡首壶。另外，百济至今还发现5件完整的青瓷鸡首壶，除了在圆光大学所藏的据说出土于清州外，其余尚不明确出土地点，现收藏于国立中央博物馆、忠南大各博物馆和韩南大学博物馆。2003年，在公州水村里第Ⅱ地区又发现了六座大型百济墓葬，其中在四号石室墓也出土一件黑釉鸡首壶^{③2}。鸡首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器物，亦称“鸡头壶”“天鸡壶”，因壶肩部塑鸡首而得名。北朝多见青黄釉鸡首壶，如太原北魏辛祥墓出土一件鸡首壶^{③3}，“釉色淡青，长颈盘口，龙首螭，鸡首流，壶肩作四系，壶高27厘米”。太原北齐娄叡墓曾出土5件青黄釉鸡首龙柄壶^{③4}。东晋南朝有青釉鸡首壶也有黑褐色釉鸡首壶^{③5}，黑釉鸡首壶多见于浙江

②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将军山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17—19页。

②7 镇江市博物馆《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文物》1973年第4期，51—55页。

②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

②9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1—2页。

③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51—74页。

③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1—23页。

③2 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95页。

③3 代尊德《太原北魏辛祥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197—202页。

③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13页。

③5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8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37、38、40、41、43页；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甘泉六里东晋墓》，《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24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南郊六朝谢琯墓》，《文物》1998年第5期，5—6页、图12—14。

德清窑，在杭州东晋兴宁二年（364）墓^{③⑥}，和镇江东晋隆安二年墓^{③⑦}，均出土过德清窑的黑釉鸡首壶。在无锡赤墩里，一个东晋墓出土两个德清窑黑釉鸡首壶^{③⑧}。百济出土的黑釉鸡首壶无疑与德清窑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视为中韩交流的又一物证，已有学者就此问题做了讨论^{③⑨}，无需此文赘述。

文献记载，百济与南北朝都有来往，有的还记录了来往路线。472年，百济遣使到北魏。《魏书·高祖纪》记载：“八月丙辰，百济国遣使奉表，请师伐高丽。”^{④⑩}北魏厚待使者，并派遣邵安与百济使臣齐去百济册封。《魏书·百济传》记载：“安等从东莱浮海，赐余庆玺书。”^{④⑪}东莱即今天的莱州，位于渤海口内，从东莱到百济，显然是要从渤海口出发，穿过黄海直接到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然后沿海岸南行到达百济。《梁书》也记载：“自晋过江，泛海东使，有高句丽、百济，而宋、齐间常通职贡。梁兴，又有加焉。”^{④⑫}这是百济与南北朝往来的线路记载。

公元5—6世纪，新罗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和大规模的征服活动，在扩大版图的同时，开始以里坊制为基础，改造建设王都。从出土资料看，建造的新罗王都在建筑形式或材料上有许多南北朝的影子，如新罗王京遗址出土的兽面瓦^{④⑬}，在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中可以看到^{④⑭}，在晋阳遗址内也曾经发现实物。这都是一种装饰性质的大瓦，用于建筑侧脊的头上，起着一种装饰的作用。新罗遗址出土这种侧脊的兽面大瓦与北朝所见的两相对比，大同小异，源流清晰，还各有时代和地方特色。

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后，经济发展迅猛，社会安定，商贸兴盛，海上丝绸之路更为发达，具体表现为：

第一，航海线路与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均有增加。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黄海航线、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上来往的商船日渐增多，与沿海国家的交流更为频繁。黄海航线和东海航线被称为北线，始发港口主要有广州、扬州、泉州、明州、登州和海州，沟通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诸国来往更为便利；南海航线被称为南线，始发港口为扬州、广州、福州、明州，沟通了东南亚、印度洋，到达波斯湾诸国，延伸到非洲。

第二，唐代经济繁荣，技术发达，商品质量精良，特别是陶瓷产品，在各国需求量很大，吸引了外商前来采购。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入华第一站，占了地利的优势，成为唐朝最大的通商口岸。为了有效管理，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征收关税，监督和管理市舶贸易。

③⑥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晋兴宁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359页、图版柒。

③⑦ 镇江市博物馆《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文物》1973年第4期，52页。

③⑧ 无锡市博物馆《无锡赤墩里东晋墓》，《考古》1985年第11期，1005—1007页。

③⑨ 成正镛等《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以陶瓷器为中心》，《东南文化》2005年第1期，24—30页；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88—113页。

④⑩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37页。

④⑪ 《魏书》卷一〇〇，2219页。

④⑫ 《梁书》卷五四，801页。

④⑬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韩国考古学重大发现 2002—2007》，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80、104页。

④⑭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67页。

第三，日本、新罗、百济诸国派遣很多遣唐使入华。以日本为例，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时期（7世纪初期），为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600、607、608、614年）。唐朝建立，经济文化更为繁荣发达，日本又派出遣唐使。从630年第一次派出遣唐使，至838年，按照史料的记载，日本派出十几批遣唐使。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随着佛教东传，许多高僧也赴大唐学习佛法，最著名的如高僧圆仁，留唐十年，以日记形式记下了中国各地寺观风俗，汇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唐代历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此书还记载了民间商船活跃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其中特别提到了朝鲜半岛新罗国的地方官员张保皋开展中韩日贸易的情况。

唐朝也多次派使者乘船到达日本，民间也有学者和高僧前往日本，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应邀东渡，弘传佛法。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他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兴建了招提寺，最后于唐广德二年（764）五月六日圆寂，葬于日本下野药师寺，立塔正面题“鉴真大和尚”五字。

中国官员也有乘船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丝路沿线诸国的，如陕西发现的唐杨良瑶墓碑记载：“（杨良瑶）以贞元元年（785）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僚，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遐迹无惮险之容，凜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仗忠信之明效也。”^{④5}杨良瑶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国信、诏书，从南海登舟，穿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一直到两河流域，通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南亚、中东国家，最后到达大食，“往返如期，成命不坠”，这是首次有名有姓的中国人经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海的记录。

日本保存着许多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遗迹或遗物，最显著者是平城京遗址。平城京模仿唐朝都城长安和北魏都城洛阳。其规模东西约6.3千米，南北约4.7千米，面积大约相当于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中央有宽85米的朱雀大路，将市区分为左右两京。京城内有平城宫和许多衙署寺院，其中平城宫占地东西1.3千米、南北1千米，有包括朱雀门在内的12个大门。其中正门朱雀门宽约25米、深约10米、算上基石的话高约22米。还有从飞鸟迁来的药师寺、元兴寺、大安寺和兴福寺，新建的金钟寺、唐招提寺、西大寺、西隆寺、法隆寺、香积寺等，都散发着浓郁的唐风。

从日本各地古坟来看，也出土不少与唐代有关系的随葬品。最典型的是高松冢古坟，高松冢古坟是位于明日香村的圆形古墓，据考证它建于7—8世纪^{④6}。该墓的墓葬形制、壁画布局和图像，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

^{④5} 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5页。部分标点、文字有改动。

^{④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考古》1972年第5期，59页。

交流之密切。该墓北墙壁上绘有玄武、东西墙壁的中央绘有青龙、白虎等，而其左右则分别绘有女子群像图和男子群像图。从画中人物的装束、手持物品以及绘于墓顶上的精度极高的星宿图等来看，它受中国唐朝时期墓葬壁画的影响很深。四神图在唐代墓葬中也很流行，如太原焦化厂唐代墓葬，就有很好的四神图^{④7}。

高松冢古坟出土有海兽葡萄镜，直径为17厘米（王仲殊先生测定，实为16.8厘米）。海兽葡萄纹镜是唐代流行的铜镜，西安唐代独孤思贞墓就出土一枚海兽葡萄纹铜镜，直径为16.9厘米，这枚铜镜与日本高松冢古坟出土的铜镜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毫无差异。它和高松冢古坟的铜镜一样，纽作伏兽状，内区的花纹是六个兽类，并配以葡萄及其枝叶，外区的花纹由许多兽、鸟、蝶及葡萄纹组成，内区与外区之间有一周凸棱相隔，缘部呈斜面内倾，遍饰云花纹。特别是，独孤思贞墓的海兽葡萄镜与高松冢古坟的海兽葡萄镜属同范镜，这充分说明高松冢古坟的年代与独孤思贞墓的年代是很相近的^{④8}。高松冢壁画中的人物有男有女，其中女子的红绿白灰相间彩条裙和山西长治襄垣唐墓陶俑中的女子俑所着长裙很相似^{④9}，都是曳地彩条纹长裙。

日本还出土多方公元6—9世纪的墓志，其中最有名的是太安万侶的墓志，全文如下：“左京四条四坊从四位下勋五等太朝臣安万侶以癸亥年七月六日卒之，养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乙巳。”^{⑤0}该墓志不是日本出土字数最多的墓志，却因为墓主太安万侶曾经编著日本史书《三国志》非常有名。从其墓志看，他住于“左京四条四坊”，透露出一个信息，左京采用的是来自唐代的里坊制，又完全使用汉字书写，干支纪年，说明唐代和日本的文化交流还是非常频繁。同时，在中国也出土有日本遣唐使的墓志，如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志文提到：“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衍）命远邦，驰骋上国。”^{⑤1}

日本收藏中国古代文物的机构，以正仓院为代表，有铜器、金银器、玻璃器、丝绸、陶瓷器、木器、史籍，具体可分为绘画、剑、镜、武器、乐器、佛具、法器、文房四宝、服饰品、餐具、家具、玩具、图书、药品、香料、漆器、陶器、染织品、玻璃品等。仅就丝绸来讲，就有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大歌绿绫袍、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其中许多丝织品，在中国已经绝迹。可以说，正仓院就是一个小型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标志是，阿拉伯沿海国家的商船来唐朝展开贸易的很多，商船的载货量远大于驼队，因此唐朝和阿拉伯地区的贸易量空前增加，北方地区仍以沙漠丝绸之路为主，南方地区即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交易商品，除旧有的丝绸商品

④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50—52页。

④8 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问题》，《考古》1981年第3期，277—278、276页。

④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襄垣唐墓（2003 M1）》，《文物》2004年第10期，43页，图十四—十九。

⑤0 王仲殊《日本最近发现的太安万侶墓》，《考古》1979年第3期，286页。

⑤1 王建新《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考释》，《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8—19页。